

“身体”视角与抗战文学

向天渊

(西南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摘要:从“身体”视角研究抗战文学,可以获得如下新认识:第一,个人身体的细微书写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紧密相关;第二,鼓励裸露男性身体,但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却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有大胆的敞开与展示;第三,赋予人物明显的美丑对比,身体成为伦理与道德的标记物;第四,高大、威武、健壮的抗日英雄,反映出对国民身体与精神的审美想象与情感诉求。

关键词:身体视角;抗战文学;细微书写;宏大叙事;情欲表现;伦理标记;身体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1-0138-06

近年来的抗战文学^①研究,至少发生了如下三大变化:第一,由强调文学中的抗战发展到注重抗战中的文学;第二,由主要研究描写敌后抗战的文学发展到认真对待描写正面战场的文学;第三,由侧重研究根据地、新中国的抗战文学,发展到全面观照大后方、沦陷区、根据地、新中国、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抗战文学,而且有关大后方、沦陷区抗战文学的研究还颇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正因为突破了此前某些思想上的禁区,抗战文学研究才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就,作家、作品、流派、文体、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巨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一些敏锐的学者也发现,抗战文学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并就如何拓展与深化抗战文学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实际上,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文学性”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之后,我们就应当考虑适度拉开距离或转换思路,期望凭借新的视角获得新的认知与阐释。对于当前的抗战文学研究,我们也不妨如此看待。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最近十多年来引进我国并颇受欢迎的“文化研究”理论,正可为抗战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得力于众多的译介与阐释,我国学者从理论上对“文化研究”已有相当的了解,但从具体实践看,将其提供的思路与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尤其是抗战文学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成绩并不明显。有鉴于此,本文打算从“身体”这个与战争密切相关的视角切入,对抗战文学进行初步考察,不仅仅是期望获得一些新见解,更主要的是想由此引出更多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

一、“身体”与“国体”——细微书写与宏大叙事

我们应该会同意,战争的首要工具不是枪炮等武器,而是使用武器的血肉之躯——活生生的身

^① 本文中的“抗战文学”类同于吴福辉先生提出的“大抗战文学”概念,“可以包括抗战十四年(我们今年普遍已经从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开始计算了)时段里面凡直接写战事、写战争阴影下的日常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间接以战争的情绪、战争的思考为中心带出来的那些叙事作品和抒情诗篇,也包括战争结束之后人们不断在反思中对战事和人加以深化和再认识的作品。”参看吴福辉《战争、文学和个人记忆》,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收稿日期:2014-07-04

作者简介:向天渊,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和合诗学研究”(1110006),项目负责人:向天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科团队)项目“中国现代翻译诗歌史研究”(2362014xk20),项目负责人:熊辉。

体。因此,当国家之间爆发战争,身体的个人属性就会暂时被忽视、遮蔽与掩藏,国家属性就会急速凸显与张扬,身体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彼此难分,这种状况也会自然反映在抗战文学作品里。

翻开老舍的《四世同堂》,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1]虽然这是祁老太爷凭借多年生活经验得出的看法,但我们也可由此看出在老舍的潜意识里,作为千年古都和中华文明之象征的北平城,对整个国家而言,就像头脑之于个人的身体一样,政治性的国家与肉体性的身躯很自然地发生了交搭,形成某种隐喻,祁老爷的生活经验,就这样具有了超经验性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加明显也是大家更为熟悉的例子。比如,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和田间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前者将“我们的血肉”与祖国的象征——“长城”、将“每个人的吼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后者将两种选择摆在读者面前,要么去保卫祖国,不做亡国奴,要么被敌人杀死,骨头也成为奴隶:“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与萧红《生死场》中农民们“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2]的哀婉、质朴的吼叫是一脉相承、声气相通的,个人的血肉之躯、切肤之痛,与祖国河山的生死存亡直接相关相连。在这样的作品中,个人的“身体”被赋予了强烈的情感与审美价值,具有特殊而丰富的思想内涵。

再者,透过抗战小说中有关交战双方士兵身体的描写,也能发现作者有用“身体”差异隐喻“国体”区别的创作意图。我方战士尤其是英雄人物往往高大壮实,敌方士兵也就是小鬼子则要么矮胖、要么瘦长。《新儿女英雄传》第九回有如下一段滑稽、有趣的描写:“天明了。敌人把牛大水拉到场上,一群鬼子围着看。矮胖的鬼子小队长饭野用手攥攥大水的手腕,那手腕儿真粗真壮啊。又用手一拃一拃地量量大水的肩膀,比他自己的肩膀宽得多。”^{[3]122}同一小说的第十八回写到被俘的日本士兵米田——“在纸上画了个大圈说:‘你们中国,大大的!’又画个小圈:‘我们日本小小的!’又说:‘你们大大的中国,把我们小小的日本——’他用拳头打了一下胸膛,眼睛一闭,身子一仰,逗得程平他们都笑起来了。”^{[3]222}如果将这两段描写联系起来,我们就会领悟战士身体之强与弱的对比,正可以视为是民族-国家层面之“大中华”与“小日本”之形象、力量对比的隐喻性描写,当然这种强与弱不仅指国土面积之大小、人民数量之多寡,更具有中国人民必胜、侵略者必败的精神意蕴。

此外,抗战文学中还有大量正面描写战斗场面的报告文学以及纪实性小说,将个体生命与祖国河山放在一起,将献出个人的身体与捍卫祖国的尊严放在一起,既素朴又感人,既自然又令人震惊。于是,有关身体的细微书写,也就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结合了起来,这种书写越是具体、越是惨烈,其所焕发的人性光辉、所激起的爱国情怀也就越发充实、越发强烈。

透过以上简单的描述,我们发现,抗战文学中所表现的英雄儿女,一方面如同祖辈先民一样,对生命珍爱有加,从不轻言生死;另一方面,为了民族-国家的解放,却可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显然,这与中国古代“贵身论”思想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既主张“明哲保身”“敬身为大”,又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身体与生命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死场》中那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何以会由“蚊子似地为死而生”转变为“巨人似地为生而死”,还可以加深我们对抗战文学中有关身体的细微书写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之辩证关系的认识与阐释。

二、“女体”与“男体”——性别特征的遮蔽与敞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就是男人之间身体与智慧的对抗。因此,在战争文学中,有关男人的身体描写是必须的,从文化、宗教与禁忌等多方面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很少有对男性肉身给予掩藏与遮蔽的必要,相反,倒是鼓励敞开裸露男性的身体,借以展示力量与血性。抗战文学中,如此这般的男性身体描写比比皆是,无须举例。但同样是抗战文学,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却显得微妙而复杂。

抗战文学中的女性,无外乎乡村妇女、市民女性、知识女性三个类型,有关她们身体方面的描写,应该说是各有侧重。如对乡村妇女,注重她们的手脚与身板,以突出劳动人民勤劳、能干的本色;对市民女性,则更为关注她们的身段、表情与打扮;而对知识女性,往往侧重她们的脸庞尤其是眼睛,当然也会涉及她们不同凡俗的外表与神情,借此展现脱俗的气质与超凡的精神^①。不过,严格说来,无论是头发、手脚、鼻子、眼睛,还是表情、身段等,都只能算是外貌或外表,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女性身体。而更能显出女性性别特征的胸、嘴、腰、腿、臀等较为敏感的部位,在早期抗战文学作品中却难得一见或干脆没有。就是《寒夜》中被婆婆视为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形怪状的曾树生,也只有类似这样的抽象描写:“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4]同样,《荷花淀》中的水生嫂,除了两次写她月下编席子时“手指”的动作,再就是写了告别水生时流下的眼泪。本来,当写到“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的时候,是可以顺势来点身体描写的,比如,湿透了的衣服紧贴着女人们的身体,凹凸的曲线,使她们感到羞怯、慌张与自豪,但或许是由于作家的有意回避,或者说欠缺对女性身体的美感意识,放过了一次展示荷花淀妇女们健康迷人之身体的好机会。

不仅如此,在战时的抗战作品中,我们甚至发现,一旦进入战争,女性的性别特征也就随之消失。比如《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在参战之前是个“大乳头,强壮,嘴唇厚厚的”^[5]十足的女人,而且,那大乳头因哺乳孩子袒露出来,被唐老疙疸从树丛篱笆的缝际瞧在眼中,使他感觉到一股迷人的气息。但在自己被敌人侮辱、孩子被敌人摔死、唐老疙疸也被敌人杀死之后,李七嫂穿上唐老疙疸的衣服,拿起他的枪加入了抗战的队伍,她那饱满、性感的女性身体也就隐藏在一件男人的外衣里面了(这样的情节演进也许正好透露了萧军的潜意识,那就是战争必然要对女性身体进行某种规范与整肃,而李七嫂与唐老疙疸这对情人双双死去^②,也就象征性地意味着战争对情欲的压抑、拒斥甚至否定^③)。

何以会这样?原因应该很多,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战争时期的创作不得不暂时悬置、消弭女性柔软、妩媚的身体特征,代之以更加坚硬、刚强的男性或者说民族性的身体,彰显同仇敌忾的精神、顽强抗日的决心。当然,这也反映出抗战的巨大动员能力,“一切为了抗战”,“与抗战无关”的欲望与情感都应该被拒斥与放逐。此外,还可能与传统文化中或女扮男装如花木兰、樊梨花或骁勇善战如穆桂英、梁红玉、秦良玉等诸多巾帼英雄对现代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就拿萧军来说,他小时候就从祖母、四叔、五姑那里熟悉了《呼家将》《杨家将》《薛家将》中的英雄故事^④。

当战争的枪炮声渐渐远去,时光转眼到了1980年代,在“新历史小说”中,作家们描写女性身体的笔触大胆起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不仅写了“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的行为,还写了“我奶奶”的心理状态:“……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哔哔剥剥地燃烧。余占鳌粗鲁的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暗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6]再比如,高建群的《大顺

① 《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杨小梅、《四世同堂》中的小顺儿的妈、《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首次出场时的有关描写,分别是这三种类型的典型。

② 李七嫂过早死去的情节安排,使不少读者和评论家感到不满和不理解。

③ 当唐老疙疸护送工人同志到司令部时,“感到自己是在干着光荣和伟大的事业了——李七嫂底胸膛,那值得夸耀的乳峰,也在这一伟大的欣喜里消泯到无影无踪了。”(《萧军全集》第1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在此,革命显然战胜了情欲。又比如,孙犁《风云初记》写高庆山离家十年后归家,居然没有描写他和妻子秋分之间的互诉衷肠,革命对爱欲的压抑也是明显的。

④ 参见萧军《我的文学生涯简述》中“从祖母那里学习分辨忠、奸,从四叔父、五姑母那里学习故事情节和韵文”一节。载《萧军全集》第1卷。

店》，通过儿时的“我”——小放牛——的眼睛，写出了“大顺店”（王茵香）光光的胳膊、红红的肚兜，光滑、羊脂一般的皮肤，以及一丝不挂、隐秘全露的身体，尤其是左边那个被日本兵咬去奶头的乳房。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说来，一是作家们在摆脱战时语境之后，得以远距离观察那段历史，难免会产生血色浪漫的情怀，而以浪漫之心与眼去看待抗日战争，那些一度被压抑与隐藏着的更具个人性与情感性的方面，就会被重新发掘出来，甚至还会被刻意凸显与放大。二是看惯了充满宏大叙事、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的新时期作家会发生叛逆情绪，他们不再从官方、正统立场书写那段历史，而是通过民间与个人立场有意解构以前抗战文学的叙事模式，表现在女性身体的描写上，也就从有意或无意的隐藏与遮蔽转向大胆的敞开与展示。

透过这种有关女性身体描写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与战时的作家相比，和平时期的多数作家对战争的感受与体认发生了改变，对战争中情爱与欲望的叙事策略，也由压抑而转为张扬，所给予的价值评判，也由排斥、否定转而趋于肯定与欣赏。

三、“美体”与“丑体”——伦理叙事与意识形态功能

文学作品往往根据道德与价值评判的需要，赋予人物身体以美丑之别，抗战文学在这一点上可谓更加突出。抗日英雄大多高大魁梧，而汉奸、鬼子则猥琐卑俗，外形的美丑与伦理上的好坏忠奸，构成明显的类比关系，身体成为伦理的标记物。《烈火金刚》中有关史排长的描写就是典型的例子：“赵连荣使劲儿揉了揉眼，仔细这么一看：喝！好大的个头儿，足有一冒手高，赵连荣要看他，都得仰着脖儿。只见他膀扇儿有门扇那么宽，胳膊有小檩条儿那么粗，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浓眉毛，高颧骨，高鼻梁，宽下巴，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他手里没了武器，紧紧地攥着两只象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全身都带着杀气。他笔直地站着，动也不动，活象个铁打的金刚。老头子心里想：这是个人哪还是个什么？”^[7]显然，金刚般的史排长已经被神化了，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个威武勇敢的大英雄，他的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充满杀气，都是英勇气概与凛然正气的自然显露。

鬼子的形象不用多说，他们的身体自然只能与奸猾、凶残相匹配。尽管有些作家并未亲眼目睹日本军人，但仍能凭借伦理与道德的标准，想象性地进行描写，而且大多将鬼子写成禽兽一般的凶残、妖魔一样的恐怖，存在类型化的弊病。随着时光的流逝，新时期的作家们更是不可能具有亲见鬼子的经历，他们笔下要么不见鬼子的踪影，要么只是模模糊糊的群像描写，要么继承以前写鬼子的传统，突出丑陋的外形与符号性质的长筒靴、钢盔帽、武士刀等等。

此外，抗战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时期”的抗战文学中，还有大量关于汉奸的描写，他们与鬼子一样，几乎都是尖嘴、猴腮、三角眼、镶着大金牙，在人民群众面前狐假虎威，在鬼子跟前则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当然，这类汉奸往往在前线替鬼子卖命，还有些汉奸则是在沦陷区为鬼子服务，前者往往是男人，后者也不乏女人。

众所周知，老舍的《四世同堂》塑造了一系列汉奸形象，其中也包括女汉奸。不过，即便是老舍，在描写那些女汉奸的时候，也未能摆脱或者说规避伦理叙事的原则，仍然以外在身体的妍媸来对应内在灵魂的美丑。且看《四世同堂》中住在同一院子里的三个女人：“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作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15]“冠太太是个大个子，已经快五十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作大赤包儿。……冠太太的脸上也有不少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她脸上的褶子与黑点。”^[18]“瑞丰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很富态；往坏里说呢，干脆是一块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没有脖子，猛一看，很像一个啤酒桶。脸上呢，本就长得蠢，又尽量的往上涂抹颜色，头发烫得像鸡窝，便更显得蠢而可怕。”^[187-88]这些看似客观、自然的描写，已经将勤劳孝顺的韵梅与卑鄙无耻的大赤包、胖菊子区别开来。

如果再细致梳理,会发现抗战文学中有关身体的描写,呈现出一种层级关系,由美到丑依次是英雄、战士、百姓、伪军、汉奸、鬼子,而这种身体上的美丑与伦理上的善恶、忠奸以及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从而为抗战文学的身体描写建构出一种伦理叙事的框架,这种框架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尽管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对这种秩序与框架多少有些冲击,比如,英雄一定程度地染上匪气,小鬼子偶尔也长得高大威猛,但这种冲击是有限度与底线的,远未达到,或许根本不能达到动摇上述那种框架的程度。由此看来,抗战文学中身体叙事的民族本位立场甚至民族主义色彩是鲜明而浓厚的。

不仅如此,这种伦理叙事往往与更加隐秘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关联。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新儿女英雄传》,将杨小梅与前夫、后来沦落为汉奸的张金龙所生的孩子取名叫“小瘦”,而将她与逐步成长为共产党员、抗日英雄的牛大水所生的儿子取名叫“小胖”,这一瘦一胖的命名与对比,不仅是身体的,也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显然,这种身体的伦理叙事功能与意识形态的寓意功能,预先规定了“小胖”与“小瘦”生与死两种不同的命运结局。换句话说就是,小说中“小胖”的化险为夷与“小瘦”的因病而死,不仅反映了身体与生命的自然逻辑,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某种伦理与意识形态的叙事逻辑。

四、“弱体”与“强体”——抗战文学对国民身体的美学想象

与强壮的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体质偏于瘦弱,近代以来更是如此,“东亚病夫”的羞辱深深刺激了几代中国人,追求强健的体魄也就成为近代中国人的梦想之一。武侠小说、功夫电影以及奥运精神中的金牌情结,都折射出中国人追求强健体魄的迫切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身体美学观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推崇文治、疏于武功的宋代之后,文学作品对男人的审美理想大多倾向于文质彬彬的才子,俗称“白面书生”,如张生、苏友白、平如衡、燕白颌等,对女性的审美理想则倾向于娇羞柔弱的佳人,大多是官宦小姐,如崔莺莺、白红玉、山黛、冷绛雪等^①。当然,在传奇、小说之中,也不乏强壮、野性的男女人物,但大都显得奇异、怪诞,与美的属性及范畴显得格格不入。即使是《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系列黑熊似的男性人物、夜叉似的女人形象,虽然对主流文化所推崇的身体美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身体想象,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没能获得文化上的强力支持与文学上的大规模延续。

不过,在抗战文学兴起之后,这一态势得到明显改变。众多小说描写了一大批英雄的中国人民,他们要么高大、威武,要么健壮、结实,即便是中等身材,也显得匀称和谐。比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黑老蔡、牛大水、高屯儿、刘双喜、杨小梅等,都是地道的农民,虽然生活在连槽子糕都吃不上的兵荒马乱的年代,但在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出饥荒带来的瘦弱痕迹。又比如《平原枪声》中的马英、王二虎、赵振江、郑敬之等,不仅身强体壮,而且要么沉着冷静、足智多谋,要么勇猛豪爽、疾恶如仇,要么武艺高强、智勇双全,要么沉稳老练、随机应变。

显然,这样的描写,与当年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是有相当距离的。假如我们将这些人物与赛珍珠《大地》中的农民形象稍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前者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出抗战文学对国民身体与精神的想象与诉求。这当然是对传统文学的身体美学或者说身体审美意识的叛逆与改造,才子佳人亦即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物,在战争洪流的洗礼下,即使没有被彻底舍弃,也被暂时悬置起来,不再视之为唯一的美学选择。而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束胸、缠足等畸形的审美塑造,也因此被淘汰与抛弃。反而是黑张飞、黑李逵、黑宋江,以及孙二娘、穆桂英等传统文学中颇具另类色彩的英雄人物,在抗战文学中得以复活,并被赋予了新的精神与思想。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白皙、瘦弱的身体显然不能适应惨烈的现代战争,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

^① 苏友白、白红玉是《玉娇梨》中的男女主人公,平如衡、燕白颌、山黛、冷绛雪是《平山冷燕》中的四个才华出众的青年男女。

必然会塑造和肯定具有健康、强壮体魄的男女人物，恰如《四世同堂》中的钱老人所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有咱们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1]309}这种战争文学所体现出的有关身体的美学旨趣，又与人性的解放、妇女的解放联系起来，而毛泽东早年所谓“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理想也在此获得某种程度的回响。其思想影响与文化价值同样不容忽视。

五、结 语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简单描述与阐释，我们发现，抗战文学中的“身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事物，而是一种兼具政治、伦理、美学、民族、国家等众多属性的“综合性肉身”，是多种势力的角斗场所。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这种“综合性肉身”给予关注与研究的时间并不长。1990年代初期国内有学者开始思考人民伦理之大叙事与自由伦理之小叙事的关系，深受青年学子的喜爱。如此一来，“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就成为小说、电影研究的重要视角。也是在1990年代之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家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人的论著受到追捧，而王德威、刘禾两人从身体视角解读丁玲与萧红的论文《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重读〈生死场〉》自然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此外，最近20来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方式对“话语”、“权力”及“身体”之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的一系列著作，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也给中国学者不少启示。上述这些实践、理论与方法从不同层面开启了有关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关系研究的新维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身体与战争、身体视角与抗战文学的关系，必将引起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与探究。

参考文献：

- [1] 老舍. 四世同堂[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2] 萧红. 生死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0.
- [3] 袁静，孔厥. 新儿女英雄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4] 巴金. 寒夜[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52.
- [5] 萧军. 八月的乡村[M]//萧军全集：第1卷.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70.
- [6]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81.
- [7] 刘流. 烈火金刚[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6.

责任编辑 韩云波